

瑞士汉学家耿宁：对“良知”与“自知”的哲学解读

□ 韩燕丽

瑞士汉学家耿宁既是研究胡塞尔现象学的专家，又是研究并践行中国哲学思想特别是王阳明心学的著名学者。1961年，耿宁在鲁汶大学完成《胡塞尔与康德——关于胡塞尔与康德和新康德主义之关系的研究》论文，并获得哲学博士学位。随后的近十年间，他在鲁汶大学胡塞尔档案馆工作，学习并整理胡塞尔文稿。1973年耿宁任教于海德堡大学并获得教授资格。但是，出于对中国哲学的热爱，耿宁于1979年放弃了海德堡大学的长聘职位，并在接下来的岁月里专注于研究中国哲学。耿宁曾前往中国台湾学习并研究中国哲学，后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南京大学、北京大学深造，并在瑞士弗莱堡大学、苏黎世大学、伯尔尼大学教授中国哲学。耿宁的著作主要有：《心的现象——耿宁心性现象学研究文集》《人生第一等事——王阳明及其后学论“致良知”》。耿宁是用现象学的方法研究王阳明心学的第一人，耿宁的工作不仅使得阳明心学得到了新的阐释，亦有助于中国心学走向世界哲学的舞台。

著名的胡塞尔现象学家

耿宁对“如何获得认识”这个问题很感兴趣，正是对该问题的强烈兴趣，使得耿宁常年深耕胡塞尔现象学。从耿宁的博士论文中，我们可以看出，康德的“先天综合判断”理论已经为“如何获得认识”提供了一个可能的框架。但是，康德的先验理论并没有具体解释意向性是如何生发的，胡塞尔的现象学则为人 的认识何以可能、人的意向活动如何产生等问题提供了更生动的描述性图景。

为了使得认识成为可能，胡塞尔认为认识需要有一个确定无疑的根

基，而这个根基就是笛卡尔的“我思”。任何事物都是可疑的，唯一不可怀疑的就是我在思考这件事。正是“我思”确立了胡塞尔心性现象学的落 脚点，即胡塞尔对认识的研究是聚焦于内在的思维领域的研究。但是胡塞尔基于“我思”的研究遭遇了很多批评者，因为“我思”很容易导向“唯我论”，这与我们日常的认识是不符的。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的认识不是封闭的自我认识，而是可以跟他人一起交流的认识。耿宁通过对胡塞尔“共主观性现象学”遗稿的整理与编纂，发现胡塞尔的心性现象学不是“唯我论”，“我思”中的“我”不是单个的“我”，而是“我们”。“我思”不仅包含我的经验，也包含我们的经验。

耿宁认为，胡塞尔的心性现象学不是“唯我论”，胡塞尔倡导的现象学还原的方法不是还原到抽象的自我，而是还原为处于情境之中的自身，这种自身与他人共处于交互主体性之中。在胡塞尔看来，我们之所以可以获得认识，是因为我们认识的是内在于认识的事物，而不是外在于认识的事物（自然科学的认识）。胡塞尔的心性现象学要求我们悬置主客体对立的外在思维模式，面向事物本身，回到原本的生活世界之中。

从心性现象学到阳明心学

胡塞尔所倡导的生活世界正是儒学思想所在的世界，儒学的思维模式没有被主客对立的思维所控制，儒学内在于生活，没有远离生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耿宁对心学的兴趣从胡塞尔心学过渡到儒家心学，儒家心学的代表就是王阳明的“致良知”学说。耿宁一开始对王阳明的“良知”

概念充满了疑惑，什么是良知？从一般思路来看，良知指的是一种先天的有关德行的知识。但是，这种对良知的理解并没有告诉我们良知在意识活动中处于什么地位、发挥着什么作用。胡塞尔认为意识是发生在内时间意识之中的，内意识虽然具有滞留与前摄的特征，但这些特征具有当下性、即时性，而非事后的反思。耿宁将胡塞尔的内意识看作是种“自知”，即每个意识活动都同时知道 自己的意识。自知概念虽然回答了意识活动如何发挥作用，但是这种自知并不具有道德的属性。而王阳明的良知概念显然具有道德的属性。如何让不具有道德属性的自知去解释具有道德属性的良知？这是摆在耿宁面前的难题。

耿宁一方面认为，良知不是意念，不是对前一次意向行为的事后反思，而是具有像自知那样的直接意识到自身的那种直接性。另一方面，良知不同于胡塞尔的自知，良知是对道德自身意识的直接意识，这种具有伦理性的直接意识本身就具有实践性。耿宁对良知进行的现象学式的分析很好地展现了现象学面向实事本身的特点。耿宁一方面在对本已经经验的反思的基础上借助于现象学内意识、自知的概念去挖掘良知在意识活动中所发挥的作用；另一方面，耿宁从有关王阳明的文本中感受良知本身的伦理蕴含，即知行合一的蕴含。

以中释西,文明互鉴

为了让现象学的自知概念更好地

解释王阳明的良知概念，耿宁认为需要修改胡塞尔对自知的理解。胡塞尔对自知的理解主要是基于认识论上的理解，即强调每个意识都是关于某物的意识。这种纯粹的认识论意义上的理解并不具有价值、伦理的维度。但是，在耿宁看来，如果我们对生活的意向是整体性的意识，那么意识、自知本身就 不能是无关伦理道德的或者说是道德中性的。我们需要借鉴王阳明对良知的理解，将道德属性赋予意识、自知之中。

在王阳明看来，“凡应物起念处，皆谓之意，意则有是有非；能知得意之是非者，则谓之良知”。在王阳明那里，良知所进行的意识活动不 只在于知道正在进行这种意识活动，还在于意识到的是否是正确的、道德的。除此之外，王阳明认为，良知不只是有关道德的自身意识，还具有伦理实践性，因为，知与行是合一的，是一件事情。

耿宁认为，胡塞尔的自知是狭义的认识论的概念，胡塞尔意义上的自知只是王阳明良知中的一部分，我们需要用王阳明的良知概念补充胡塞尔的自知概念。耿宁用胡塞尔心性现象学分析王阳明的心学，并不是为了让王阳明的心学转变为现象学理论，而是为了让现象学意识分析的方法服务于对阳明心学的理解。耿宁的工作不仅丰富了王阳明的心学，回答了良知是如何在意识中发挥作用的，亦丰富了胡塞尔心性现象学，让现象学成为面向实践理性的意识学说。耿宁对中西心学的互鉴不仅促进了中西心学的发展，亦有助于中西互动，传播中国传统文 化。



鲸俗称“鲸鱼”，但不是鱼。它是体型巨大、身形似鱼 的海洋哺乳动物，与陆地上的河马有着最近的亲缘关系。“京”在汉语中意为“巨大”，古人顺其字义，将这种外貌像巨型大鱼的动物称之为鲸。

（一）

鲸鱼诞生时间可以追溯到距今约6000万年前。那时由于地球温度过高，陆地几乎一片荒凉。鲸鱼始祖巴基鲸，为了生存勇敢地下海了。它本是陆地野兽，满口利齿、长相似狼、四脚如牛蹄，下海后很快成为鳄鱼、鲨鱼等生物的猎物。随后，水陆两栖的游走鲸出现了。但由于陆地行动能力退化，海洋防御能力尚不足，它处境尴尬，无法完成海洋生存大业。

鲸鱼真正在海洋中生活，从距今约4600万年前的罗德侯鲸开始。它脖子变短、后腿变宽形似鳍肢、尾巴长出肌肉，整体更能保持平衡，更适合潜水。除了身材改变，决定它海洋生存的秘诀是，长出内耳中的平衡器官。借助这个微小精妙的器官使身体快速转向和翻滚，罗德侯鲸能够灵活有效地逃脱捕猎者追捕。

从猎物变为猎手，归功于现代鲸的近亲龙王鲸。在距今约3950万年前，有“帝王蜥蜴”之称的龙王鲸拥有30多米体长、6300公斤体重，并进化出一套令人惊叹的猎食武器：超群的视力、灵敏的水下听力、鳗鱼般瘦长的流线型身体，可以征服绝大多数海洋生物。但这一时期龙王鲸并非海洋霸主，因为巨齿鲨崛起了。巨齿鲨身长超过16米、重达4万公斤，一颗牙齿有成人手掌那么大，几乎可以秒杀同时期任何生物。在角逐中，龙王鲸屡屡败下阵，最终被“海洋霸王龙”巨齿鲨征服。这时，随着南极洲永久冰盖的形成，海平面快速下降，大量浅海区域消失，龙王鲸又因为只适合浅海生活，难以适应环境改变，最终走向灭绝。

挽救危机局面的是一种曾与龙王鲸同时期存在，但毫无存在感的矛盾鲸。它身材短小、肌肉强健，反转成最后的赢家。距今约3000万年前，在水温剧降的大西洋中部，身长只有5米的矛盾鲸被迫向深海觅食，这给巨齿鲨提供了好“食”机。为了逃离追击，矛盾鲸远离赤道，前往形成不久的极地海域。矛盾鲸是恒温哺乳动物，可以耐寒，而巨齿鲨却做不到，因此可以独享极地海域饕餮盛宴。

虽然没有巨齿鲨的猎杀，但海冰覆盖下的海域能见度极低，如何突破暗环境猎食，鲸鱼面临生存瓶颈。距今约2800万年前，腔头鲸进化出了声呐。它发出目标明确的高频声束，声波碰到任何物体都会反弹回来，通过对回声分析，就能确定猎物的大小、形状、速度，从而进行精确袭击。为了能够通无阻地深潜以征服大自然馈赠的粮仓，它还通过控制通往心脏和大脑的血液，保证深潜时会有足够的氧气。如现代抹香鲸可以下潜2000—3000米，并停留长达2小时。至此，鲸鱼终于完成了海洋生存必备的进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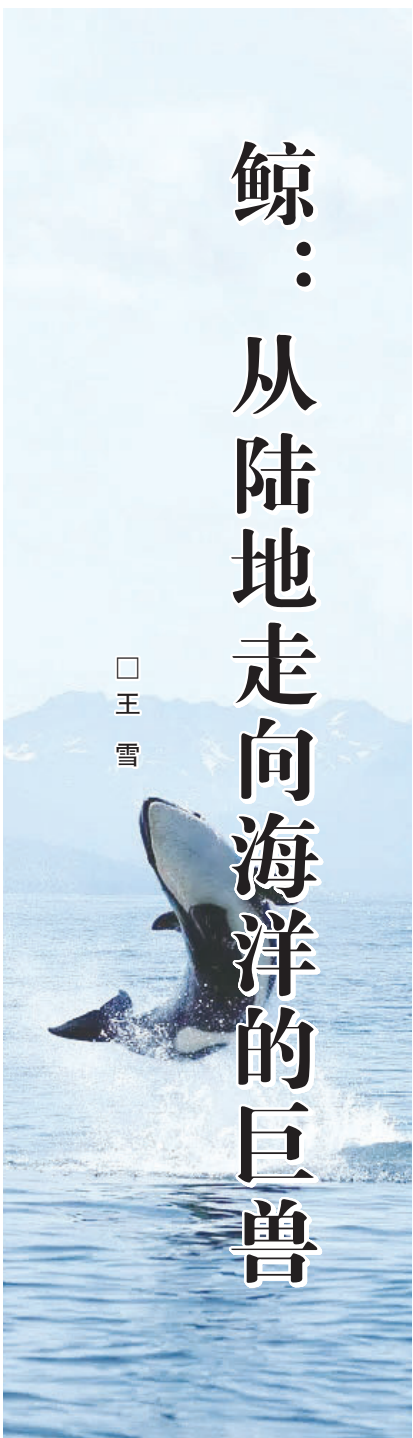
（二）

人们常夸赞的“浑身是宝”，用在鲸鱼身上再恰当不过。鲸鱼肉能吃，舌头是专供神职人员和贵族享用的美食；脊椎和肋骨是制作椅子和篱笆的材料；乌贼的喙经过鲸鱼的消化系统形成的龙涎香，是十分昂贵的香料；鲸须是西方女子裙子的骨架、被用作固定骨折患者的断肢或做成了雨伞的伞骨；鲸鱼产生声呐的区域被称为鲸脑，也称鲸脑油，是最好的蜡烛材料。本杰明·富兰克林最喜欢用鲸脑烛光看书……人类对于这么用途广泛的鲸鱼，从未停止血腥杀戮。

古代北美印第安人和爱斯基摩人把鲸鱼作为重要的肉食、燃料和工具的来源。在同时代，北欧海洋分割大陆的地理特征和寒冷的气候环境，使当地土著居民无法依靠种植庄稼来过活，捕鲸是当时人类能够在大海上以及海岸边唯一能够从事的工作。这种捕鲸行为有值得肯定的一面，人类从远洋获得食物资源是一项生存发明，从此可以方便获得肉食和脂肪，有利于人类族群生生不息的繁衍。

到了近代，人类的捕鲸形成了产业，演变成血雨腥风的海洋大屠杀，美国捕鲸业发展就是其中最为浓重的一笔。美国殖民者因为土地太贫瘠无法耕种而开始捕鲸，于1712年杀死了第一头抹香鲸。19世纪，美国成为全球捕鲸业的中心，在全球900艘鲸鱼船中，约700多艘来自美国，捕鲸成为美国第五大产业。

这一新兴产业的壮大，主要是因为鲸油可以照明。如18世纪初，伦敦为



□ 王雪

打劫夜间犯罪行为，在全市范围内安装油灯。这些油灯从日落到日出长夜不灭，每年总时长多达5000个小时。这些灯里静静燃烧的，正是鲸油。

人类发明内燃机后，对鲸油需求达到了高峰，鲸油的价格可以跟黄金相媲美。丰厚的利润促进捕鲸业的进一步扩张，当时一艘捕鲸船就像是一座在大海上的移动工厂，把鲸鱼捕捞上船以后，工人就地熬制鲸油，否则鲸鱼一旦腐烂，就失去了价值。为了捕鲸，人类凶狠残忍，捕鲸人常常先抓住幼鲸，让鲸鱼母亲不忍离开，最终一起熬成一桶桶鲸油。著名小说《白鲸》就讲述了这段令人震惊的捕鲸史。这种屠杀直到19世纪50年代末人类发现石油，逐渐取代鲸油照明剂和工业上润滑油的作用，才有所改善。但由于其他行业对鲸鱼的需求，比如时装业，把捕鲸业的衰落延迟到了19世纪末。

（三）

海洋是世界上最大的自然生态系统，在实现人类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应对气候变化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就应对气候变化和维护海洋健康来说，鲸鱼从生到死都可谓贡献卓著。

活着的鲸鱼为大自然碳捕获作出贡献，归功于巨型粪便。鲸鱼的粪便非但不会污染环境，还富含磷、铁、氮等大量浮游植物生长所必需的养料。凡是鲸鱼聚集的海域，浮游植物就十分茂盛。浮游植物光合作用时会消耗大量二氧化碳并产生氧气。数据显示，全世界浮游植物可捕获约370亿吨二氧化碳，相当于1.7万亿棵树，也就是4个亚马孙雨林；为地球大气贡献50%到85%氧气，相当于人类每呼吸5次，其中就有1次的氧气来自浮游植物。

鲸鱼平均寿命70年，最长可达268年，一般体重能达200吨。在漫长的一生中，鲸鱼能够通过进食把碳积累并储存在自己体内。死亡后，它的尸体以及体内封存的碳一并沉入海底，继续为深水生物提供丰富的营养，这个过程有一个非常浪漫唯美的名字——“鲸落”（whale fall）。在北大平洋深海中，至少有1万多种生物依靠鲸落生存。从鲸落提供的生态系统，可以长达数十年甚至上百年，能够为大到食腐动物、小到细菌的深海物种提供大量的直接食物来源，可谓是天上掉馅饼。

一鲸落，万物生。生于海洋而归于海洋，这是鲸最华丽的谢幕。



鳌山灯彩的考古与文献

□ 刘 明

鳌山灯，又名“鳌山”“灯山”“彩山”。既是灯彩，为何取名“鳌山”？不仅因为形廓如山，还因为鳌山灯彩源于蓬莱仙山的神话传说而得名。早在古代文明形成时期，我们的祖先就留下了丰富的神话传说，它们在古代文明起源与形成的考古学研究当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注疏和阐释作用。

（一）

2008年春，河南省濮阳县郎中乡东王海村出土了1596盏鳌山灯碗，均为黑色、白色陶瓷制品。经文物部门鉴定，灯碗属清代制品，系鳌山灯会告演时所用之盛器。王海村素有灯会习俗，每逢龙年举办一次。清光绪年间，这一节俗达到鼎盛，但在清朝灭亡后，因战乱和灾荒而失传。这批鳌山灯碗的出土，弥补了既有研究中器物考证之不足，为鳌山灯彩的文献和图像研究提供了实证，也为定州、秦淮、芦溪等地鳌山灯彩工艺和非遗传研究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群英诗话》说：“鳌山灯，山也，结彩为之。”鳌山灯的艺术造型，多见于宋以来的文献记载。《宣和遗事》描绘了鳌山灯的巨大气势：“自冬至日，下手架造鳌山高灯，长一十六丈，阔二百六十五步。”《武林旧事》记录了鳌山灯中的珍品“苏灯”和“无骨灯”。苏灯者，“图片大者径三四尺，皆五色琉璃所成，山水人物，花竹翎毛，种种奇妙俨然著色便面也”。无骨灯者，“福州所进，则纯用白玉，晃耀夺目，如清冰玉壶，爽彻心目”。汪元量有诗：“鳌山灯月照人嬉，宣德门前万玉姬。记得那年三五夜，快行擎驾倒行归。”描写了元宵夜观鳌山的繁盛景象。

至明代，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将

扎灯技艺和秦淮风俗带入京师。明代历任君王重视鳌山灯会在民间的影响力，多次于午门外广场，扎制“鳌山万岁灯”。灯山沿袭宋制，以竹子、木材作为支架，悬挂放置各式各样花灯万余盏，辑集典故、传说、风俗、佳景于灯山之上，被誉为“灯中显贵”。鳌山下灯，百艺群工献艺，舞龙灯、耍狮子、玩旱船、扮杂技、走高跷的表演队伍依次出场，观者如潮，热闹非凡。然而，正如《酌中志》所言：“但火烛担惊，糜费甚巨，思及民瘼，实可惜焉。”永乐十三年正月之壬子，鳌山火发，此后元宵观鳌山不在午门举行，移至他处。

清朝吸取午门鳌山灯火的教训，对灯山进行了改良。一方面，沿袭元夕赐观鳌山、联句鳌山灯诗之元宵饮食习惯传统，于季冬交年时起至新正，在乾清宫安设鳌山灯。另一方面，又将清宫鳌山灯朝日常性、艺术性、观赏性发展，不再拘泥于元宵灯节习俗的框定。存世的大量清代档案显示，清宫鳌山灯在告演种类、艺术造型、故事内容、文化功能、审美意趣诸方面，更加凸显了民间文化的叙事内容和形式。

（二）

学界普遍认为，东方蓬莱神话与西方昆仑神话构成了中国两大仙乡神话系统。早在汉代，既已形成“览观县圃，浮游蓬莱”的神圣格局。《山海经·海内北经》载，“蓬莱山在海中，大人之市在海中”。东晋郭璞注曰：“上有仙人宫室，皆以金玉为之，鸟兽尽白，望之如云，在渤海中也”。“蓬莱”被赋予“仙乡”“乐园”的象征意义。重新检视《楚辞》《列子》《列仙传》《海内十洲记》《拾遗记》等先秦以来的古籍文献可知，

“大壑归墟”“巨鳌戴山”“龙伯钓鳌”等情节彼此关联。究其始源，“海中蓬莱”神话皆以“大壑归墟”的神奇伟力之变幻推动故事发展，“蓬莱”神话之神圣性，即在于仙山与大壑之间，“蓬莱”孕育着早期文明的初萌。

一般认为，鳌山灯彩的艺术原型取义《列子·汤问》。“龙伯钓鳌”典故记载：远在渤海之东几亿万里有“大壑”名曰“归墟”，“实惟无底之谷”，“八纮九野之水，天潢之流，莫不注之，而无增无减焉”。“大壑”中有“五山”，“五山之根无所连著，常随潮波上下往还”，“帝恐流于西极，失群仙圣之居，乃命禺强使巨鳌十五举首而戴之”。故事中的“大海”“大壑”“五山”“巨鳌”“大人”等多彩的神话元素，为后世巧妙运用，在“蔓延之戏”、鳌山灯会、盆景鳌山、元宵灯谜等艺术表现形式当中，葆有着原生文明的火种。

先秦古籍《楚辞·天问》既已援引“鳌负仙山”的典故发问：“鳌戴山抃，何以安之？”较为晚近的《古今图书集成·鳌图》《天问图·鳌戴山抃》等图像资料可与“鳌负仙山”典故互为印证。至迟于汉代，“鳌负仙山”之戏已经初具规模。汉《西京赋》载，平乐馆有“蔓延之戏”，《文选》薛综引《汉书》注之：“武帝作漫衍之戏也。神山崔嵬，歛从背见。伪所作也。兽从东来，当观楼前。背上忽然出神山崔嵬也。熊虎升而拿攫，狼狄超而高援，皆伪所作也。”“大兽”“神山崔嵬”“歛从背见”“令负神山于背”之云云，可以清晰捕捉到鳌山灯彩的雏形。

所幸的是，当前存世的岁时风俗图恰好可与典籍文献互证互释。《明宪宗元宵行乐图》、《南都集会图》和《上元灯彩图》均绘有鳌山灯棚。图

卷直观可见“龙伯钓鳌”故事当中的典型形象和物像符号，灯山上有龙、凤、麒麟、鳌鱼、狮马、虾蟹、仙鹤等祥瑞之物，另有荷花、石榴、南瓜等寓意吉祥的文化符号。《红楼梦》第五十四，“芦雪庵争联即景诗 暖香坞雅制春灯谜”，林黛玉所制灯谜为：“驂阿雾缥缈紫绳？驰城逐势犇犴。主人指示风雷动，整背三山独立名。”可见，时至清代，“龙伯钓鳌”典故仍在广为运用，其艺术再现之形式多种多样，并不拘泥于鳌山灯彩的告演。

（三）

过会盆景鳌山，是以盆景和鳌山灯巧妙结合的新的艺术形式。通过4份晚清《过会大盆景鳌山钱粮册》和1份嘉庆十年正月二十日档房《为女仙过会盆景应用铁拔齿本处向无办过式样骤难赶办咨复圆明园事》的研究，确信可知的是：造办处各作为其制作人物、花会、鸟兽、树木、瓜果、庙宇、山门、牌楼等景致，施以齿轮、转轴、托板等零件用于告演，另有抬歌、猴戏、竹马、打把势以及承应各会档登记在册。

若将钱粮册所载的承应会档名目与之对比，不难发现，过会大盆景当中所描画的场面、故事和人物与民间口头传统之走会逻辑内在一致，文化语境高度吻合。可见，清官习俗与民间艺术构建了一套完整的知识谱系。

鳌山灯彩，从远古神话里走来，生动注解了先秦典籍中的“蓬莱”，也譬画出百姓心中“天下承平”“盛世繁华”的幸福愿景。

